

我的木兰科研究历程 兼忆恩师

夏念和

(1963~)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，研究员。2000~2007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。

初次见老师应该是在1990年左右，吴老到华南植物所参加植物区系课题会议，住在华南植物所所部的招待所，我作为陈封怀的弟子去招待所领吴老去陈封怀老师家，当时彭华兄作为吴老的秘书，有年纪相仿的彭兄在场，和老师的交流倒没有太多的拘束，向老师简单汇报自己的情况后，就一起去见陈封怀老师。

1999年底，在德铎兄的劝导下决定在职攻读博士学位。当时由于身体原因，老师已基本停止招生，未曾想到德铎向老师转达我的意愿后，老师欣然同意我报考，这样我就于2000年秋正式注册成为吴老的弟子。

2000年3月份博士考试完后，就和德铎去拜访老师，鉴于我的工作经历和当时所承担的任务，吴老就决定让我的博士论文做中国木兰科的分类修订，并希望我以木兰科为基础，深入研究原始被子植物的起源演化。

中国木兰科的权威为华南植物所的刘玉壶教授，他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潜心研究木兰科，完成了《中国植物志》30卷1分册木兰科的编写。刘先生平易近人，对木兰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极深的感情，因研究木兰之故，在所里许多老一辈都直接称他为Dandy，但不知何因，他一直未允其嫡系弟子研究木兰。在植物区系课题期间，承蒙刘老垂青，为其木兰科的区系绘制分布图，对木兰才开始有点了解。《Flora of China》中木兰科的任务也是刘玉壶先生承担的，刘先生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赴美查阅标本，本科的外方合作者是Flora Malesiana木兰科的作者——荷兰的Hans Nooteboom。刘玉壶与Nooteboom在木兰科分属上有很大的分歧，两者也很难沟通（可能是语言



2009年5月看望恩师



问题)。1998年初,美方催稿催得急,华南植物所胡启明先生找到我,让我协助刘玉壶先生完成《Flora of China》的编写,这样开始走进木兰王国。

2000年秋,老师坐着轮椅到当时植物化学研究室的会议室参加我的开题报告,他对刘玉壶先生和Nootboom的关于木兰科分属的争论非常清楚,也不同意Nootboom的大属概念,认为将许多属并到一个大的木兰属,使属的概念过大,不能反映木兰科的演化过程和生物地理分布格局,他的这种思想对我处理木兰科分属有重要的影响。后通过查阅标本才知老师其实在早期对木兰科有相当深入的研究,昆明所标本馆的木兰科标本,老师都研究过,许多标本都有老师订的名字,包括刘玉壶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所发表的几个新种都是依据老师早期的鉴定发表的,如灰岩含笑(*Michelia calcicola*)。后我因承担《Flora of China》木兰科的编写,特申请院高访名额赴Kew和Leiden进行短期研究,得以查阅欧洲主要木兰标本,并在朱光华的努力下于2005年赴美研究木兰科。随着Santae Kim(2001)基于叶绿体*rbcL*序列分析结果的发表,Nootboom对木兰科的归并走向极端,并于2004年与Figlar一起将木兰亚科所有的属都并入了木兰属。我于2003年大年初一从Kew前往Leiden,并在Leiden与Nootboom工作了3个月,一起讨论有关问题。通过对几大标本馆标本的研究,我对木兰科的分属有了自己的观点,认为木兰科分类无法达成一致的主要原因,是Dandy将所有每心皮含2颗胚珠的类群都置于木兰属之下,要厘清木兰的分类就必须对木兰属进行切分,这与Nootboom的观点不同,也与Dandy的坚定追随者——刘玉壶先生的观点不一致。当时若追随Nootboom的观点(其时国内已有人采用其观点),许多事情会很简单,文章也很容易发表,虽然与Hans相处很好,我们也在种的处理上达成一致,但对于属的处理,我们有很大的分歧,他坚持合并,我则坚持要切分木兰属(*Magnolia*)。

在我进行论文答辩时,老师的眼睛经过两次手术后,视力已经非常差,还是认真审阅了我论文的大纲和对木兰科分属的处理,对我有关切分木兰属的做法表示赞同。

老师对我的工作非常关心,也对华南植物园的发展极为关注。每次拜访老师,老师都会向我询问胡启明、吴德邻的工作和身体情况,并向我了解华南植物园的大致状况。

在吴老名下,我算是入师门最晚的几个弟子之一,也是令老师经常惦记的一个弟子。虽未能如师兄们可常在老师身旁,聆听老师的教诲,但每次出差到昆明,也必定拜访老师,向老师汇报工作进展,并期望老师指点迷津,老师也是每次都有问必答。能成为老师的弟子,是我一生之幸,弟子不才,将谨遵老师教导,继续深入研究木兰科及其他原始被子植物的起源演化。

